

当代西方家庭模式变迁的理论探讨: 世纪末美国家庭论战再思考

陈璇

(南京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随着西方从以工业化生产为组织形式的现代社会逐渐转型为以知识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 作为人类基本整合形式的家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变迁。20 世纪末美国现代核心家庭模式在人口统计上已完全失去了主导地位, 家庭的变迁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激烈的论战。女性主义批判了功能主义建构的现代家庭刻板模式, 推崇后现代家庭模式, 并在家庭多样性的研究中积极建构多元化的后现代家庭形象。后现代情境中家庭模式的深刻变化也吸引了主流社会理论家的关注。贝克提出“协商家庭”模式, 吉登斯构想亲密关系转型、情感民主化, 从反思现代性视角探讨社会从制度上超越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家庭模式从现代向后现代的变迁。

关键词: 家庭模式; 家庭变迁; 家庭多样性; 现代核心家庭; 后现代家庭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8477(2008) 01- 0076- 05

一、时代变迁背景下美国世纪末的家庭论战

西方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 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以工业化生产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逐渐过渡到以信息与技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或曰以“知识”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现代性不断在衰减, 不确定性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代的变迁增加了个体的选择性也瓦解了人们对于存在绝对的、固定不变的现实的信仰。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整合方式, 家庭相应也发生了激烈变迁。

在当代西方社会, 以现代核心家庭为主导的家庭模式(family pattern) 乃至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经历了几十年的冲击后, 到了 20 世纪末已普遍显出风雨飘摇之态势。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自 60 年代起离婚率持续攀升, 到了 80 年代半数初婚家庭以离婚为结局, 而且专家估计 80 年代末的初婚者将有 67% 离婚。^[1](p37-51)]与持续高离婚率相伴的是单身母亲家庭(single-mother household) 比例的上升。1970 年母亲与 18 岁以下孩子组成的家户占美国家户总数的 12%, 1980 年上升为 19%, 1990 年继续上升为 24%, 1995 年达到了 26%, 占全美家户总数的四分之一强。^[2]非婚生育比例日趋上升。1970 年, 美国新生婴儿中 10.7% 为非婚生育, 1993 年非婚生育比例上升为 31%, 到 1994 年这个比例达到了 37.8%。^[3]此外, 非婚同居的普遍化、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等都表明了美国

家庭的多样性变化。到了 20 世纪末的美国, 家庭已没有一个主导模式而呈现出一个体系的状态。没有哪一种家庭模式能占到人口的大多数。由丈夫挣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夫妻共同抚养未成年孩子的典型现代核心家庭模式占美国家庭总数已不到 15%, 双收入家庭、单亲家庭、独身户等家庭模式总体上远远超过了五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体现白人中产阶级价值的现代核心家庭模式。^[3]

世纪末的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种族、性别、宗教等价值的冲突交织在一起, 围绕着婚姻、妇女的平等权、同性恋权利、儿童教养与福利等家庭问题在大众媒体、在国会、在州立法会, 各界人士展开的论战激烈而火爆。对家庭变迁的讨论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争端交织在一起, 以功能主义取向的新保守主义社会批评家 David Popenoe 和女权主义学者 Judith Stacey 为首形成两大主要阵营。保守主义者对家庭的变迁持悲观的态度, 哀叹家庭的式微、父亲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传统价值的沦丧以及社会秩序的破坏。Popenoe 坚决主张, 家庭主要是一个养育孩子的社会设置, 理想的家庭是夫妻生活在一起, 共同承担对子女的责任, 以及承担相互之间的责任的现代家庭(modern family) 模式。^[4](p527-542)]Popenoe 所主张的现代家庭模式体现了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主流的家庭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者则对家庭的变迁持乐观的态度,

作者简介: 陈璇(1971—), 女,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4 级博士研究生。

认为家庭没有式微而是为了应对这个时代新的工作与社会形式而在结构上发生了改变。^{[5](p642-544)}Stacey 不主张父母为了孩子而维持家庭的完整。她推崇“后现代家庭”(postmodern family)模式,认为后现代家庭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重组性的。^[6]即家庭未必由双亲组成,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组成形式。她甚至认为在后现代背景下双亲家庭不太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稳定的婚姻系统依赖于社会系统模式的平衡性。^[7]面对着新世纪的来临,家庭模式将是怎样的变迁趋势?女性主义从概念上提出并通过经验研究积极建构后现代家庭模式,对西方主流家庭意识形态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世纪末的美国家庭论战在历史和当代西方社会整个时代背景下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二、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核心家庭

在理论界,社会的发展与家庭模式变迁研究一直备受社会学的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使有别于乡村传统家庭的都市家庭大量出现。芝加哥学派把当时正在涌现的城市家庭模式作为一种城市病、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认为传统的生活模式(包括家庭模式)正被邪恶的城市化力量所破坏,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作为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体的现代化理论更聚焦于与工业化相联系的现代家庭模式。其代表人物古德在他的著作《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正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变;家庭正从扩大的血亲家庭模式向夫妇式家庭(conjugal family)(即独立的核心家庭)模式的变迁。他强调传统的扩大家庭对工业化起了阻碍作用,而夫妇式家庭模式是十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

芝加哥学派及后来的现代化理论都认为,早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那种令人满意、舒适的扩大家庭是前工业社会美国典型的传统家庭模式,而核心家庭则是工业化的产物,是新出现的现代家庭模式。这一观点后来受到了来自历史学剑桥学派的挑战与修正,社会学家认识到只有从家庭功能的变化以及家庭同其他社会制度联系的变化才能准确地理解家庭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乡村人口继续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城市核心家庭急剧增加,学者们纷纷建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结构功能主义奠基者帕森斯论证并提出了美国家庭理论。他指出,孤立的核心家庭是美国亲属制度最独特的性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家强调工业化对家庭的消极影响,帕森斯则认为孤立的核心家庭不受传统扩大家庭强制性的亲属关系的妨碍,能满足工业社会固有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就业机会,和工业制度之间非常适合。而且,核心家庭满足家庭的两种主要的社会需要:儿童社会化和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依托。因而,由双亲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标准的美国家庭模式。^[8]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在美国逐渐确立其霸主地位,学者们开始钟情于深入探讨帕森斯所建构的美国家庭理论,进而形成一种神话式的家庭刻板

类型。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于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高度一致与劳动分工。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围绕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角色结构类型而组织起来。男人的工具性角色将家庭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女人的表达性角色维系着家庭内部的团结。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划分与社会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部分相对应,都是适应发达工业社会的互补性的制度安排。双亲家庭是家庭跨越时空的唯一模式,它是普遍存在的,它是基于男女生物差异的制度安排,是一种自然的结果。^[9]结构功能主义者将现代家庭模式理想化,并称之为“正常家庭 the normal family”,将一些不能或不愿遵循这种模式的家庭边缘化。

女性主义者认为,功能主义建构的这种现代家庭刻板模式成为了美国社会一种意识形态的规定,它左右着理论的建构、公共政策的制定,甚至影响科学的家庭研究。^{[5](p642-544)}在科学研究领域,美国及西方社会对家庭多样性(family diversity)的研究直到70年代才开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很多家庭,包括黑人家庭、同性家庭、继父母家庭、单亲家庭等长期被忽略、被扭曲。

三、女性主义对家庭的解构与重构:围绕家庭多样性的探讨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性主义批判就解构了许多关于女性与家庭的功能主义假设,揭示了功能主义建构的现代家庭刻板模式本质上对女性的压迫。

功能主义把家庭视为一个成员间利益和睦的统一整体,而女性主义研究则揭示了男人和女人对家庭的不同体验,批判了功能主义对女性体验的忽略。Bernard在其对婚姻的经典研究中指出,一个婚姻的结合体中其实存在两个婚姻,他的和她的,他的婚姻常常比她的婚姻更惬意。^[10]家庭其实充满了权力的争夺,是男人和女人“斗争的场所”。在功能主义二元分立的范畴中,家庭被划定为私人领域,被浪漫化为与外面世界分离的避风港,女性主义研究对“两个分离的世界的神话”提出了挑战,认为家庭是和社会制度与结构相联系的,这种二元预设试图通过把家庭理想化而掩盖社会不平等。^[11]女性主义强调从社会系统入手来分析家庭,解构家庭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对立。随着女性主义视角在美国家庭研究中日益扩大其影响,功能主义所推崇的家庭的唯一性、统一性与和睦性等研究主题日渐让位于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的等女性主义关注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的出版,兴起于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达到其鼎盛时期。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性,反对本质主义,而且强调社会能够像文本那样解读,对行动的解构也从强调结构转变为强调文化。

在后现代背景中女性主义发生了嬗变,不再以争取男女平权为宗旨而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女性本身,承认两性差异,主张消解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同时,女性主义也分化成不同形态,有的在既有的框架中展开研究,有的则对“正统”提

出挑战,并寻求新的认识论以展开对社会规范的批判。社会建构论构成了后者的一个核心观念。社会现实被视为一个性别的建构,那些被强调、具有剥削性的历史形态被认为是与男性相关的,从公共领域到诸如情感等私人领域在问题的界定、理解和规范批判上都存在性别子文本。^[12]而且女性主义同时也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它不同于解构主义,不否定整合的重要性,并试图终止不确定性,其规范批判的目标是在解构现实的同时指出一种建构现实的不同方式。她们认为,现存的现实是围绕着性别(男性中心)而被社会地建构,为了给女性带来新的机遇,现在需要在其中表达出女性的经验并进行重构。^[12]

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女性主义批判推动了主流家庭研究重新思考“家庭”的定义,不再将结构功能主义者建构的理想的核心家庭模式视为“家庭”的同义词。女性主义对结构功能主义把家庭界定为一种制度提出了疑义,并从建构论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家庭。Stacey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建构。它有着政治内涵,随着历史而变迁,而不是跨越时空泛在的固定模式。家庭中男性与女性角色安排并不是基于生物差异的自然结果而是社会的建构。功能主义那种单一的、规定性的家庭定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无视种族、阶级、性别多样性的存在,而且这样定义家庭更加剧了种族、阶级、性别之间的不平等。^[7]后现代家庭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重组性的。^[6]

“家庭”的重新定义和建构论的视角推动了美国家庭多样性的研究。在世纪末的美国社会,随着现代家庭模式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单身母亲家户的剧增。一些女性主义研究不再从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性地位的传统视角来理解女性主导的家户增多现象,认为这种家庭的变迁对于女性而言未必完全是坏事,相反它具有积极的影响:女性与婚姻关系的新自由有利于妇女自主性的成长。^[13]Stacey视野中的女性也是相当自主的,她指出在后现代家庭中,女性运用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与家庭变动,她们的家户结构随着配偶、恋人、孩子和朋友的加入或离开而扩大或收缩。^[6]但是鉴于美国相当比例单身母亲家户贫困化的现实,很多女性主义者对这种乐观的视角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多种族女性主义(multiracial feminism)通过考察种族、阶层等制度情境中的家庭,把对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从家庭的内部扩展到家庭之间和社会宏观结构。在考察了多种族家庭后有研究指出,家庭多样性的特征不仅在不同群体的内部存在,而且与性别、种族、阶层相联系的权力关系塑造着所有家庭经历和家庭多样性,尽管塑造方式不同。^[14]这表明在种族越来越趋多元化的美国,家庭的模式与关系不再只局限于两性的差别而是包含了处于不同种族、阶层等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及其与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关系。

酷儿家庭(queer family)的女性主义研究突破了人们关于同性恋与婚姻家庭的传统认识。Weston先锋性的民族志研究,《我们选择的家庭》(Families We Choose)从历史建构

主义视角揭示了血亲家庭(blood family)之外还有选择的家庭(chosen family)的存在。她认为这种选择的家庭是当代西方文化变迁导致的家庭模式的转型,它不是血亲家庭的对立,而是家庭模式的补充。^{[15](p261)}同性恋原来被认为是与家庭相互对立的,是对婚姻家庭的“反叛”。Weston提出的“选择的家庭”把同性恋与家庭相联系,拓展了后现代家庭的内涵。还有同性恋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质疑异性恋作为现代家庭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合法性,认为性取向就像种族和阶级一样,是一种不平等机制,它制约了同性关系的发展。^[16]

女性主义推动了家庭研究从一元家庭(现代家庭刻板模式)视角到多元家庭视角的转换,从性别视角扩展为探讨家庭与种族、阶层、性取向等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的关系的视角,在建构论的视野中对现代家庭模式进行重构,在家庭多样性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使后现代家庭模式逐渐获得合法性地位。女性主义倾向于认为,美国世纪末所表现出的婚姻的式微、单亲家庭的普遍、同性家庭的显化等家庭变迁,是西方几十年来后现代情境中社会、经济、政治不协调的后果。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结构多样性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对家庭的支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更深层的问题。

四、社会理论的视角:从现代化发展审视家庭模式变迁

20世纪晚期出现的多元化后现代社会给现在和未来带来完全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的不确定性,作为社会基本整合形式的婚姻家庭所面临的巨大变迁已不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的关注而被主流理论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发展理论家将家庭模式人口统计上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变迁等宏观经济背景相联系。Smith等指出,家户类型的多样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17]

在后现代背景下,社会理论突破了现代意义上创造知识、整理结构的角色,面临着对人们的常识进行挑战等新任务。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也从各个角度展开。“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R·英格莱哈特指出,在当代西方这个处于转型的时代,20多年的繁荣稳定使人们的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的转型,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工具理性”让位于体现后现代性的“价值理性”。但是,现代性对“世俗化”与“个性化”的价值追求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延续成为后现代的核心价值。在婚姻家庭观念方面强调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自由选择等,既是现时代的精神也体现未来发展的方向。^[18]

著名的社会理论家贝克、吉登斯等从反思现代性视角,探讨社会从制度上超越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家庭模式从现代向后现代的变迁。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社会概念不同,贝克用风险社会指称当代社会,认为科技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后果严重的人为风险对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峻挑战,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新的形态转变。^[19]贝克认为,这是个在本质上不安全的基础上运行的时代,是个全球性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渴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创造者的时代。在德国,原来安全的、以男性为绝对优势的标准

就业模式向缺乏安全性、更为灵活的方式的转变削弱了性别劳动分工等传统预设,相关的社会关系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e),个体自身成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再生产单位。个体化的发展导致了能带来安全感的稳定的亲密关系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男人、妇女及孩子对于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新需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现代核心家庭模式面临解体的危机。贝克提出了“协商家庭”(negotiated family)的替代概念,认为夫妻双方以情感的舒适来调节。^[19]这样的家庭模式,能为个体赢得更多的平等、安全和利益。但是这种家庭模式不稳定且松散,整体上并没有真正赋予家庭内部成员更多的安全感。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对生活世界、对情感关系产生了高度殖民化,要应对这种殖民化需要一种在情感民主化基础上的新型感情模式。^[20]情感民主(emotional democracy)理念的含义是家庭、婚姻等情感关系和公共领域的民主一样也是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民主形式。亲密关系民主化的意义也不再局限于与公共领域分立的私人领域,而是会从两性之间以信任关系扩大到更广泛的人际环境。与现代性不同,个人生活的民主就这样由边缘走向中心,使当代社会的民主运行方向出现了由个人层面到国家政治等公共层面的逆转。吉登斯将女性主义所强调的解构家庭与公共领域之间对立的立场,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上升到制度层面加以理论化。

以“情感民主”作为反思现代性的商谈民主的主要形式,吉登斯从商谈民主机制运行的视角来审视当代社会家庭模式的变迁。“风险共同体”是吉登斯探讨情感民主的逻辑起点。他认为,当代社会改变了个人的生存理念,像家庭这样的传统共同体正在解体,新的共同体是以风险作为其基本动力、由持不同文化的参与者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的“风险共同体”。在风险共同体的基础上,当代婚姻家庭正经历着“亲密关系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朝着所谓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演进。这种纯粹关系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缔结和保持的关系,因为它可以产生与他人或其他组织发生联系的补偿,婚姻正成为一种公共符号。在这种的婚姻家庭模式里,没有家长的权威,家庭成员之间是一种对话协商关系,关于亲密关系的特征与能延续的时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必须相互磋商而不是预先假定。^[21]换言之,在当代西方社会背景下,进入或离开婚姻的决定逐渐开始基于个体的意愿而不是义务。婚姻家庭的基础从永久的、义务的承诺转变为自愿的、可终止的契约。吉登斯的“情感民主”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它和贝克提出的“协商家庭”模式一样反映了当代西方家庭的无根之感。

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不安全不仅仅是一种环境的背景,还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状态。在传统终结的基础上,人们不再知道如何继续。过去被想当然地接受的价值和预设现在变得问题重重,需要被质疑和清算。当代西方家庭模式的变迁不仅仅是经济变迁的结果,更体现了文化的型塑。在这个时代,理论的作用空前突显。女性主义发动了一次对家庭社会规范

的批判,而且指出了建构“家庭”的不同方式。吉登斯构想着在亲密关系转型、情感民主化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婚姻家庭模式。但是吉登斯还指出,“社会科学并不是保持中立的……社会科学家应该警惕其理论和概念对他们试图分析的现象的改变能力。”^{[21](p77)}尽管女性主义者一再指出现代家庭模式不可能在后现代社会占主导,但是政治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们却对其基本上不予考虑,因为这挑战了主流的家庭意识形态。在家庭这个体现人们深层价值的领域,个体化发展与社会整合的促进之间的和谐,无论在当代西方还是中国都值得进一步地思考与探索。

注释:

家庭模式 family pattern(form, type):从家庭的结构特征视角,可以按照不同标准把家庭分成不同的模式(类型):根据社会所认可的婚姻形式,可划分为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以及群婚制;根据家庭中的婚姻和子女状况可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等;依据家庭权威的结构,可以分为父权家庭、母权家庭和平权家庭;根据世系追溯方式,可以分为父系家庭、母系家庭以及双系家庭。社会学的家庭研究者比较关注根据家庭中的婚姻和子女状况所划分家庭的(家庭模式类型)及其特征。本文即从这一视角讨论家庭模式。

家庭多样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家庭模式的多样性,即除了典型的现代家庭模式(异性恋的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家庭模式,如同性恋家庭、单亲家庭、继父母家庭等。二是家庭过程的多样性。包括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互动关系、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等方面的不同特征。^{[22](p235-237)}女性主义对家庭多样性的分析更注重结构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Martin T. & Bumpass,L.1989 Recent Trends in Marital Disruption Demography.
[2]U.S. Bureau of Census. 1996. Statistics abstracts of the US:1996 (116th edition). Washington D. 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Coontz, Stephanie. 1997. The Way We Really Are: Coming to Terms with America's Changing Famil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4]Popenoe, David. 1993. "American Family Decline, 1960-1990: A Review and Appraisal"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55, No.3.
[5]Stacey, Judith. 1993. Good riddance to "The Family": A Response to David Popeno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
[6]Stacey, Judith. 1990. Brave New Families: Stories of Domestic Upheaval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7]Stacey, Judith. 1996.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 Boston: Beacon Press.

[8]Parsons, T.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XLV(1943).

[9]Kingsbury, Nancy and John Scanzoni. 1993.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In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ed. Doherty, W.J. et al. New York: Plenum Press.

[10]Bernard, Jessie. 1972. The Future of Marri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1]Kanter, R. M., 1984. Jobs and Families: Impact of Working Roles on Family Life. In Work and Family, ed. Voydanoff, P. Palo Alto, CA: Mayfield.

[12]Harding, S. 1983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Dordrecht: Reidel.

[13]Hartmann, Heidi 1981. The Family as the Locus of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Struggle.

[14]Baca Zinn, Maxine. 1994. Feminist Rethinking from Racial Ethnic Families. In Women of Color in US Society, ed. M. Baca Zinn & B. Thornt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5]Weston, Kath. 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Collins, P. H. 1994. Shifting the Center: Race, Class, and Feminist Theorizing About Motherhood. In Mothering: Ideology, Experience, and Agency, ed. Glenn, E. N.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17]Smith, Joan,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H.D. Evers. 1985. The Household and the World Econom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8]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 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43 Socie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20]Giddens, Anthony.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1]Giddens, Anthony. 1996. In Defence of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2]Fine, Mark A. 1993. Current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Family Diversity: An Overview of the Special Issue. Family Relations, Vol. 42, No. 3, Family Diversity. Jul.

责任编辑 高思新

(上接第 75 页) 社会化,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家庭教育:

第一, 创新家庭教育机制。家庭教育不是孤立的教育, 必须构筑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 形成全方位教育机制。既要注重大环境的营造, 创造积极向上的精神环境、健康文明的文化环境、和谐融合的人际环境, 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 又要努力营造小环境, 注重发挥家庭、学校、邻里、社区等微观环境的作用, 使之相互协调, 形成合力, 共同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化。

第二, 转变家庭教育观念。^{[40][11]}家庭教育不能只关注孩子的学习, 还应注重青少年非智力因素的发展。非智力因素指个体的道德、习惯、性格、做事态度等。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 不少父母单纯的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 却忽视了青少年非智力方面的素养。父母必须转变观念, 认识到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共同作用才能构成完善的个体, 从而加强对青少年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第三, 完善家庭教育方式。传统的家庭社会里, 父母以权威的姿态出现, 强制性地对孩子进行教育, 我们的研究表明, 这种模式已远远不适应青少年社会化的需求了, 这就要求父母变权威为民主, 轻强制, 重交流, 在家庭里形成开放式的民主交流环境。父母既要满足青少年的正当要求, 又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限制, 既保护青少年的自由活动, 又给以社会和文化训练, 这样才能协助学校和社会实现青少年的顺利社会

化。

第四、强化家庭教育技巧。我们的研究已经指出, 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必须掌握一些家庭教育的技巧。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心理逆反, 使用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将会使青少年偏离社会化的轨道, 出现意识和行为的偏差。在家庭的教育过程中, 父母要成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 既要多与青少年沟通, 和他们保持亲密关系, 做到行事善解其意, 又要管治青少年, 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做到说话掷地有声。当和青少年交流时, 父母是青少年的朋友, 当教育青少年时, 父母是青少年的师长, 只有父母处理好这两个角色的转换, 才能够使青少年得到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代欣. 人格发展与青少年社会化[M].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 2004.

[2]胡文芳. 浅议现代家庭教育的社会化功能[M].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4, (5).

[3]吴佩杰. 论家庭教育中的价值引领与青少年社会化[M]. 教育与职业, 2007, (18).

[4]袁霞. 试论家庭教育与青少年社会化[M].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 (12).

责任编辑 李瑞霞